民建聯「新丁」傳承薪火服務社區

——區選觀察系列評論之七

□樂陵君

【區選觀察】

今年區議會選舉，傳統建制派核心力量民建聯，不僅牢牢把握着經濟民生主旋律，而且參選團隊中亦諸多新面孔，給人留下清新靚麗、朝氣蓬勃的深刻印象。11月8日，民建聯舉辦「出選新星，薪火相傳」造勢活動，爲這些首次參選的候選人鼓勁打氣。一衆「新丁」身穿印有選舉編號的嶄新藍色馬夾，鬥志昂揚，信心滿滿。他們從長輩手中接過象徵愛國愛港光榮傳統和眞誠爲香港宗旨的紙火炬，以示傳承的信念、拚搏的勇氣和爲基層民衆服務的決心。

民建聯為社會培育輸送正能量

在民建聯早前公布的171人參選名單中，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的「新丁」共有36人，佔二成以上。這個比例數字表明，全港最大的建制派政黨在內部更新換代和吸納新鮮血液方面成效顯著，也展示其大膽啓用新人和務實培育年輕一代的智慧和膽略。這個適應香港社會發展變化趨勢，努力爲香港社會培育和輸送正能量的舉措，爲複雜的香港政壇作出了良好示範。正如其中一位「新丁」所說，「手接紙火炬卻倍感沉重」。

「實事求是，爲您做事」是民建聯在這次區選提出的口號。作爲根植於基層二十多年、在全港十八區幾乎每一個角落都留下艱辛腳印的政黨，所提出的口號具有沉甸甸的分量，是對未來的激勵，也是一直爲選民認可的事實表述。這次披掛上陣的「新丁」，多數分布於九龍、新界的社區，是中下階層民衆聚集的選區，例如葵青、西貢、元朗等地，而且都面對反對派政黨參選人的挑戰，尤其是民主黨、工黨和街工的競爭對手，一些人還面對「傘兵」的挑釁。

區選對這些「新丁」而言，無疑是一場硬戰，是嚴峻考驗。然而，在他們的臉上不見一絲的畏懼和猶疑，反而充滿自信。原因何在？在於他們所代表的政黨民建聯，爲香港發展和長遠利益長期耕耘、不懈努力，長期致力於社區服務，爲基層民衆謀福利；在於每個參選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屬於哪個社會階層，都有一顆愛民爲民之心，都有致力於基層工作的決心、信心和勇氣。參選觀塘秀茂坪中的「新丁」張培剛，能夠在無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就是一個實例，極有說服力，表明當區選民對民建聯的信任和對這個朝氣蓬勃「新丁」的期待。

國家的「十三五」規劃業已制定，一個創新發展浪潮已經掀起。特區政府正致力於將施政重心轉移到經濟民生上來，凝聚正能量推動社會發展，特首正在爲新年度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徵詢各界意見。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區議會選舉的主旋律始終是經濟民生，儘管反對派一些政黨企圖改變這一主調，試圖以「改革區議會功能」「雨傘落社區」，甚至以激進「本土」「港獨」主張來干擾、破壞，以便從中漁利，但直到目前，事實已經證明這種試圖改變區議會性質，以空洞政治口號來填補社會服務和基層工作欠缺的構想和選舉策略，都是行不通的。

服務社區是從政必經之路

民建聯的主要競爭對手民主黨，上月中亦爲區議會選舉造勢，提出了志在必得的「搏盡」口號。該黨副主席說，民主黨一向支持年輕人參政，希望不同資歷的黨友互補長短，全力應對區選硬戰。雖然民主黨也推行年輕化，今屆參選人的年齡較過去兩屆爲低，而且超過二成四參選人爲30歲或以下，最年輕的參選人年僅21歲。但是，這個香港政壇上資格最老的反對派，並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前兩屆的區議會選舉中，參選人數雖然大增，但當選的區議員數量卻由近60位銳減至42位。這次民主黨連參選人數都比上一屆減少了二成四，嘴上說「精兵制」，內心卻很清楚，這個在區議會議員人數佔第二位的政黨，已經江河日下，難挽頹勢。這與該黨近年來熱衷於在街頭造勢勝過在社區深耕不無關係。

另一個反對派政黨公民黨，長期輕視基層工作，甚至將艱辛的基層工作污衊爲「蛇齋餅糭」。公民黨現有7位區議員，今次只有25人參選。故此，在微不足道的數字上，很難談這個自恃清高「大狀黨」的新面孔和年輕化問題。然而，這個在「佔中」期間大顯神通的反對派核心政黨，卻明裏暗裏鼓動所謂「傘後組織」參政，將街頭政治的一些訴求帶到區議會選舉中。被稱爲「傘兵」的青年，據說人數有半百，打着各種旗號，分散於各選區。由於缺乏社區工作成績的積測，一些人甚至完全無心於未來社區繁瑣艱辛的工作，只對區議員這個「光環」興趣極大，其結果不難預測。加上反對派內部的明爭暗鬥，這一群充滿「政治」熱情的青年，正處於尷尬局面：或被利用來應付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或被標籤爲眞假「傘兵」，甚至被曾經的鼓動者抱怨，沒有到自動當選的選區去阻止建制派區議員在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勝出。「傘兵」的這種困境，無異於給一些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年輕從政者敲響警鐘，也從一個側面反襯出民建聯「新丁」的幸運和所選擇方向的正確。毫無疑問，這些「新丁」的成長，正在爲有志於從政的每一個香港青年樹立了榜樣。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出選新星，薪火相傳」造勢大會對「新丁」加以勉勵：服務社區是一條艱難卻是正義、建設、承擔之路，社會要發展就要有更多年輕人走這條路……要用實績和誠意感染市民。或許，這可以說是民建聯的致勝法寶，是民建聯二十多年風雨歷程，由小變大，由弱到強的經驗總結。每一個希望從政的青年都應當謹記。

反對派支持港大泄密居心叵測

□錢志庸

【有話要說】

由馮敬恩透露港大校委會議內容開始，後有李國章、紀文鳳錄音曝光、法庭頒臨時禁制令、港大與商台和解、五名人士或團體申請成爲答辯人或介入訴訟人，再有疑是王荔鳴錄音被上載於台灣討論區，泄密風波一浪接一浪。

商台承諾不再播放錄音，表面上看是港大贏了，做了對的事，也爭回了面子。但筆者卻認爲，商台播出錄音在新聞界已是搶盡風頭，表面妥協，實際亦是想「出完位再擺彩」，其實也是贏家。

反對派支持泄密所持之理據不外乎一點，認爲會議內容涉及公衆利益，披露內容是正義之舉。筆者在報章看到五方人士的代表律師在庭上陳詞，說服法官接受他們的理據。筆者個人認爲，法官亦會疑惑大學內部的副校長任命，能與公衆利益扯上多大關係？筆者在想，若依此邏輯，那麼任命大學校長，可以上綱上線到關乎國家安全？

不過，有人始終不死心想「撩交嗌」。香港記者協會、《蘋果日報》、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港大學生李熙信及《學苑》總編輯劉以正，均申請成爲答辯人或介入訴訟人，都希望能徹底推翻禁制令。他們的舉動，無疑是要港大公開所有會議內容，成爲「無掩雞籠」，喪失應有權利。憑筆者個人所見，這些連基本法都想推翻的人，到底是無知，還是其實立心要將大學推向無政府狀態，想自己話事？

筆者嘗試逐一分析各方加入官司的原因。《蘋果日報》和記協除了基於其偏激政治立場的政治目的，可能也有想要更多的新聞空間，想報道無所限制的因素。不過，筆者卻對葉建源的目的甚疑惑。筆者猜想，唯一的解釋是他代表教育界偏激一派，表面說爲了港大，實際是不忿陳文敏被否決。或許也是因爲他支持陳文敏的政治取態吧。對於李熙信，他的目的極不明確。筆者建議李同學，作爲法律學生，應多專注在學業上，好好完成課程。一旦未能入讀法律專業文憑（PCLL），只怕會後悔。至於劉以正，《學苑》一向傾向反對政府，筆者認爲，劉以正加入官司，明顯是對政府不信任和不滿。

其實他們所要求的，已遠超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的限度。如若法庭最後頒令，要港大公開以往和將來的會議內容，港大和香港社會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當任何人都可以評論會議內容，校委會再不能放膽提出意見，可能只說一句「我不同意！沒有解釋。」校委會的運作大受阻礙，港大泛政化惡風將無可遏制，港大淪爲「無掩雞籠」雞飛狗走。百年寧靜校園的學術環境和校務自主由此淪喪，後果不堪設想。

作者為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律師

反對派邀美一起禍害港大

□方靖之

【港事港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反對派政客，日前趁美國衆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率團訪港時，厚顏無恥向佩洛西「告洋狀」，要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大學事務。

據報在會上，有反對派人士指出，港大是香港的指標，如果港大有問題，即代表香港亦有大問題存在。有人更聲稱，香港制度和價值正面臨着多方面的破壞，需保障港大成爲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橋頭堡。又透露美國多間大學擬透過院校以至公民社會，就港大事件提供支持云云。所謂支持也者，其實就是要求華府「動員」美國大學，配合反對派干預港大的行動，插手港大的高層任命。這是赤裸裸的侵害大學院校自主！反對派還一直擺出一副捍衛港大自主的姿態。其實，反對派賊喊捉賊，他們才是這次「政治干預港大」風波的眞正黑手。

港大高層任命屬於港大內政，反對派本身已經無權置喙，美國人更加毫無發言權。請問美國有什麼權力介入香港大學的事務？而港大人事任命爭議又與美國何干？反對派將事件拿到會議上討論，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視美國人爲主子，任何香港的大小事務都要向美國主子報告，盡顯反對派的「奴性」。二是說明反對派要大打國際牌，企圖將港大風波上升至國際事件。他們向佩洛西獻計，可通過美國的大學「支持」港大風波，這等如是說，如果華府不方便直接出手介入港大事件，可以通過美國的大學向香港施壓，例如發幾個聲明、找幾個學者出來評論一番之類，藉此將事件不斷炒熱。

反對派高舉院校自主的旗幟，表面上宣稱介入事件是要捍衛港大的院校自主，說白了是要硬奪港大管治權。港大風波本質是大學的任命權之爭、管治權之爭。反對派若眞是要捍衛港大自主，怎會開門揖盜，邀請外國勢力介入？反對派由始至終竭力將港大事件政治化，目的是要干預大學內政。眼見捧陳文敏爲副校長功敗垂成，於是又將矛頭指向校委，採取偷錄竊聽等卑劣手段攻擊抹黑校委，在各大學間發動狙擊個別校委行動，現在更公然勾連外國勢力介入。總之奪港大管治權之心不死，以致港大成爲政治風眼。

樹欲靜而風不息，反對派絕不會輕易停止干預港大的行動。至少他們要將風波延續至區議會選舉，炒作選舉議題，並以此作爲打擊建制派「彈藥」。所以，《蘋果日報》連日來不斷炒作竊聽的內容，繼續煽風點火，目的就是要延續爭議，影響11月22日的區議會選舉選情。市民應該看清楚究竟是誰導演這場風波，又是誰不讓這場風波結束，不讓港大恢復研學環境，令港大一再受傷害。區議會投票日，正是向反對派展示不滿的最好機會。

如何改進香港管治？

□周八駿

【知微篇】

十一月六日，歷時逾三年、三度受阻於立法會的創新及科技局撥款議案，終於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批准。特區第四屆政府終於可以在既有政策局架構中增設一個主管香港創新及科技政策的局，誠然是有利於特區管治和施政的好事。但如此「多磨」，令人唏噓。

能通過創新及科技局撥款議案，歸功於立法會財委會主席果斷「剪布」和建制派議員堅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同大多數反對派議員迫於第五屆區議會競選在即必須顧及民意相關。僅極個別激進反對派議員繼續「拉布」，阻力小，「剪布」也就不太困難。

施政效率有待提升

然而，這不是立法與行政關係改善的徵兆。就在十一月五日上午，立法會又一次「流會」。本屆立法會自二〇一二年九月產生以來，極不正常的「流會」，變得司空見慣。在這一次之前，「流會」者無論屬何政治團體抑或獨立人士，紛紛向公衆說明情況或道歉；這一回，除個別「流會」者向公衆解釋外，大多數甚至懶得解釋。人們不能不質疑：難道立法會「流會」，已由「習慣」變成「自然」?!

耐人尋味的是，本屆政府最高層似乎對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一位被公認勇於負責的主要官員，先是在立法會一次會議上宣稱「官到無求膽自大」，強力反擊反對派議員；接着，在立法會最近一次「流會」後公開表示，今次「流會」令其個人「喜出望外」，因爲讓其本人有時間出席另一個其心儀的公開活動。政府網頁刪去那一段屬於「臨時爆肚」的話，但是，媒體紛紛引述以「立此存照」。

香港立法與行政關係惡劣之源在何方？有一種觀點歸咎香港缺乏政黨政治，政府非由主流政黨組成。表面看似乎成立。但深入分析發現，根源是香港的政治基本矛盾，即「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陣營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之爭。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解決，香港政治政黨化的結局，將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演變成兩大對抗的政治團體或政黨，這固然爲香港信奉西方政治模式者所憧憬，但必定導致香港永不安寧。

西方政治模式的發源地正陷於「政治癱瘓」。至今所有關於西方民主制度缺失的研究，都開不出根治的秘方。政治學者福山曾經鼓吹人類歷史在全球普及西方民主制度時「終結」，其最新觀點是，良好管治必須是「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制（Accountability）三者的平衡——「國家」意味着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構成對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福山的新觀點是具爭議性的；但是，把「國家」權力與「問責制」（民主）區別，反映一個基本事實——政黨政治未必導致二者平衡。

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惡劣，主要責任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百般阻撓和干擾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應提高管治和施政水平。

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體現於兩個層次，一是主要官員層次，一是公務員體系，前者形成決策，後者實施行政。

政治中立早不合港情

從第二屆政府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以來，乞今，在主要官員層次，主要問題是缺乏關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共同理念。這同主要官員政治背景不同有很大關係，同香港缺乏關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經驗總結和理論研究有相當關聯，二者都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公務員體系是植根於「九七」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傳統的政治中立原則，只適應於「九七」前香港管治體制。隨着香港社會愈益政治化、政治愈益政黨化、兩大對抗政治陣營爭奪特區管治權鬥爭愈益白熱化，傳統的政治中立原則早應揚棄。

在「九七」前絕大部分時間，政治中立的公務員不需要面對立法機關分區直選挑戰。而今，公務員作爲合資格選民，一再參與立法會分區直選投票，怎麼可能沒有或不表露他們不同的政治傾向？

持有明確政治傾向的公務員，能夠完全做到不將其政治傾向滲入日常工作嗎？如果答案是「否」，那麼，特區政府的行政豈不是無法維持傳統政治中立原則？

總之，無論在哪一個層次，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都受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制約，不與時俱進，則陷於施政泥沼。須致力解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這是「綱」，綱舉才能目張。

反對派在立法會阻撓和干擾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是香港缺乏良治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如果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政策議案存在缺陷，那麼，即使建制派全力「護航」而破除反對派阻撓和干擾，也不能確保良治。即使政策是好的，爲立法會所通過，但若行政缺失，也無法實現良治。

誠然，解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之「綱」不能代替制定各項政策措施之「目」，後者除了要求總攬全局和瞻望長遠之能力，還需要各項專業知識和經驗。因此，行政長官及其問責團隊需要提高關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能力，公務員體系需要與時俱進地適當改革，這才是改進香港管治之道。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從「習馬會」論兩岸關係

——歷史性僵局已破，結構性僵局待解

□鄭　飛

【兩岸互動】

2015年11月7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兩岸最高領導人在新加坡正式會面，這是兩岸在長達66年的分治之後首次最高領導人會面。爲了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關係，兩岸領導人擱置了官方頭銜，以「先生」互稱。習近平先生與馬英九先生握手的那一刻無疑是歷史性的時刻，而這個歷史性時刻的背後，卻是兩岸關係66年的歷史性僵局。兩岸本是一脈，血濃於水。回溯歷史，國共合作玉成抗戰大業，但兄弟鬩牆，戰端開啓，終導致兩岸分治，關係陷入敵對，兩岸關係的歷史性僵局也因此產生。

兄弟情　斷不了

俗話說：「兄弟親，打斷骨頭連着筋。」兩岸血脈相連，同爲炎黃子孫，兄弟間或爭或和皆是「家事」，解決民族內部之事，豈容他人插足。然而在現今兩岸關係格局下，兩岸最高領導人尚未能「互訪」。馬英九先生若到北京參加會面，定會被綠營人士大肆抹黑成「進京面聖」、「自我矮化」、「企圖以個人屈從框限台灣的未來」等等，以莫須有罪名打擊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政治形象。所以爲了體現兩岸政治「對等」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紛爭，又有李光耀成功促成「汪辜會」的珠玉在前，會面地點選擇了新加坡，這個被兩岸視爲「自家人」的華人爲主的國家。

正因兄弟情，斷不了，兩岸在分治66年裏，爲打破兩岸關係的歷史性僵局作出不少努力和嘗試。例如1993年的「汪辜會」，2005年之後國共兩黨之間的「黨對黨」的系列會面及交流等，有效推動了兩岸關係走向合作與交流。因爲有了「汪辜會」和國共兩黨會面交流的鋪設，所以才有今次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才有了這次打破解兩岸關係的歷史僵局的歷史性握手。

破冰後　水乳融

歷史性僵局是表層的，需要用誠意和時機去打破。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僵局則是深層的，除了需要誠意與時機去打破，但更需要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視野及胸懷。因爲兩岸關係錯綜複雜，它既不能用國際關係的眼光去審視，也不能以國家治理的角度來思考。正如兩岸關係研究學者鄭振清教授所言，兩岸的關係形態既不是像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那種完全分裂的國家關係形態，也不是如香港、澳門那樣前殖民地回歸祖國的關係形態，而是一種既有政治軍事對立，又有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分治」關係形態。這種關係形態需要兩岸以全新的視野及思維去對待、梳理。由於兩岸因長期分治而導致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明顯差異，尤其是政治制度不同，對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僵局影響最大，可視爲兩岸關係結構性僵局的核心。政治制度不同導致兩岸政治氛圍迥異，導致兩岸對於一些政治行爲涵義的解讀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國共兩黨都承認「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的原則，北京政府提出「堅持一中，擱置內涵」的主張，即是堅持一個中國的總體原則，但「中國」的具體政治內涵可以先不談；但國民黨卻解讀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正因這種不同解讀，再加上一些政客別有用心地曲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衍生出「兩國論」，最後更演化成「一邊一國」論述等，由此引發1999年的台海危機，兩岸關係跌至冰點。

可以肯定的是，「習馬會」成功打破了兩岸關係的歷史性僵局，進一步則是準備破解結構性僵局。這對兩岸的最高領導人們是智慧、心力、視野以及胸懷的考驗。如今兩岸領導人會面僅顯示了雙方致力團結的誠意和意願，容易受到國際形勢和台灣政情變化的影響，缺乏一種雙方普遍接受的制度設計，來確保兩岸關係的和平推進，而這種制度設計將是破解結構性僵局的關鍵。破解結構性僵局的過程不應是個急進的過程，它須如馬英九先生所說的「循序漸進」的過程，結果則是「水到渠成」。智慧、視野、胸懷加上契機和際遇是「水」，有了「水」，破解兩岸關係結構性僵局終能「渠成」，這是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期願。　**作者為城市智庫成員**